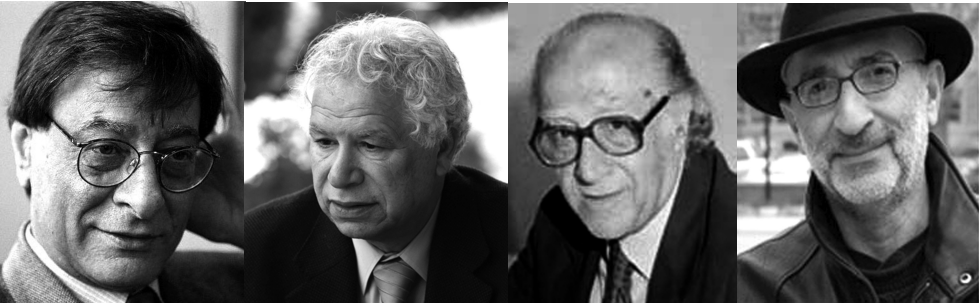


经典



马哈穆德·达尔维什穆利德·巴尔古提杰布拉克·易卜拉欣·杰布拉克安通·沙马斯

2009年初,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发表了题为《高墙与鸡蛋》(又译《以卵击墙》)的演讲辞,在其中,他含蓄地批评了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种种做法,并称:“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毋庸置疑,在拥有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和大国支持的对方面前,巴勒斯坦几乎始终处于弱者的地位;在世人眼里,巴勒斯坦人的形象或是悲惨无助的难民,或是手无寸铁的战士,或是孤注一掷的危险分子……巴以之间的冲突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不公平的斗争。把持着回归原初家园的中心叙事,以色列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对于同一块土地的拥有权,甚至有意将巴勒斯坦民族叙事从世界历史与文化记录中抹除。这一挑战迫使巴勒斯坦人奋起抵抗,在收复合法权利的同时,对自我身份进行艰难的再定义。由此,在文化层面,巴以冲突演变为两种民族主义叙事的彼此对抗。

这就使得记忆浮出意识的地表,上升为对抗演进的场域,一如当代巴勒斯坦最伟大的民族诗人马哈穆德·达尔维什所言:巴以冲突,实质上就是“两种记忆的斗争”。博物馆、纪念馆、历史教科书等是民族公共记忆的绝佳场所,却可能将记忆抽象化;相比之下,鲜活的个人记忆真正提供着关于苦难历史具体的、忠实的见证。对于巴勒斯坦民众而言,宏大历史叙事场所的阙如更凸显了个人记忆的重要性,这又对以具体性为核心界定尺度的文学艺术提出了进一步要求。也正因为如此,回溯性的叙事在当代巴勒斯坦文学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分量。

这种回溯性叙事,在体裁上表现为自传和自传体小说的层出不穷,在写作策略上则表现为追忆手法的频繁登场。也许,对于失去故土的人来说,自传体是惟一能够表达存在感的疆域,而追忆是连结往昔与当下的有力途径,通过追寻过去能够确证自我的存在。虽然,说巴勒斯坦自传体文学的任务依然离不开总体的“个人救赎”,但它常因民族的政治危机引发,其间,个人与其共同体的命运已然密不可分。

翻开那些以深沉的基调铺就的巴勒斯坦自传,令人唏嘘不已的除了作者稠得化不开的家国情怀,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也许就是作者笔下记忆的钩沉:一件旧物、一缕熟悉的气息、抑或一片空间、一处昔日的场景……

譬如,长期流亡伊拉克的巴勒斯坦著名作家杰布拉克·易卜拉欣·杰布拉克有部自传名曰《第一口井》,写于1987年,是晚年的他对于童年岁月的回忆。“第一口井”,指的是巴勒斯坦的哈布鲁克作家老家中那口古老的深井。在杰布拉克的印象中,井水是那樣的清甜甘洌,井口因井绳的长年拉扯而沟壑纵横,使整口井愈发飘洒着岁月的香醇,并前绿荫匝地,和风习习,每天大人们干完农活后来此小憩,孩童们下学后来此嬉戏玩耍,或干脆由老师带着在井边上

天涯异草

巴黎蒙巴纳斯的“花木街”有个“绿磨坊”,供人在紫藤架的荫庇下品尝美味法餐,饮酒喝咖啡,颇具乡野风情。但华都更红火的休憩处所,当数蒙马特尔高地脚下的“红磨坊”,这是现今来法国观光的各国游客首选之一。

彼卡尔广场的“红磨坊”

地处巴黎红灯区的“红磨坊”蜚声全球,名气甚至超过卢浮宫等文化胜地,自建坊以来,已走过了120多个春秋。这家歌舞厅不仅献歌献舞,其名称也成了法国的文化象征。2010年,当地著名歌星米歇尔·朵赫等15位艺术家在全国巡回演出,推出新曲《红磨坊》,颂赞这座“非凡的磨坊”,一下子便在圣日丹、尚贝里、波尔多、尼斯、图鲁兹、卢昂、阿维尼等30来个城市里传唱开来,听众眼前展现出“红磨坊”神秘的情影,脑中想起2001年由巴兹·鲁曼导演、获戛纳电影节好评的美国影片《红磨坊》,沉浸在好莱坞明星魅力、基德曼表演的凄婉情事里。以“红磨坊”为题的书籍在蒙马特尔高地几家书店也处处可见。例如,在雅克·阿巴斯新著《“红磨坊”的秘密》这部学识渊博的著述里,作者回顾红磨坊“奥德修斯般”的历史,讲了1001件有趣的轶事,尤其是其中的红颜绯闻,从“春歌女”伊沃特到“艳舞女”蜜丝坦盖特,重现歌舞升平的梦境。

1889年,已经在巴黎拥有“奥林匹亚”歌厅的西班牙人约瑟夫·奥雷和查理·齐德勒二人在华都第十八区克里希林荫大道开设了“红磨坊”,一时门前车水马龙,寻芳的骚客趋之若鹜。那里,音乐舞会每天从晚上22点开始,场面极尽奢华,令人目不暇接。当年最媚人的节目是“克雷奥佩特拉的游戏”。“埃及艳后”由四个强壮大汉托举着闪亮登场,陪伴于四周的是如花似玉的年轻姑娘,一个个娇态慵懒地躺卧在鲜花装饰的牙床上,引入遐思神驰。

20世纪初,“红磨坊”几度易主,但始终以

以记忆抵抗权力——当代巴勒斯坦文学一瞥

□余玉萍

课。在巴勒斯坦人的传统起居中,有了水井才能生起炊烟,才能安生立命,因此水井是他们安家或乔迁时首要关注的问题。杰布拉克描述的这口老家的深井,既是巴勒斯坦百姓曾经拥有的安宁、稳定、团聚、祥和的象征,又是他本人一生中汲取艺术和生命经验的源泉,想起这口井,作家就想起他虽然贫穷却不乏幸福的童年,就拥有了前行的动力,正如他在另一部书中写道:“我的童年依然是我最丰赡的源泉……它是井,是泉,赋予我的头脑多重想象力,我希望这口井永不枯竭。”杰布拉克一生才艺超群,在诗歌、散文、小说之外尚通晓音乐、美术,且早年便留学英国,阅历颇丰。深谙西方文化、崇尚世界主义的杰布拉克为何如此怀念童年及其老家的井?因为它“能将我带回家乡,带回那个在家乡的土壤上,在懵懂无知中成长起来的我。它对于我,象征着世界的真、象征着我的祖国的纯洁。它不断地向我肯定:在经历了伤痛、流离之后,需要回归最初的朴拙,因为在那里,蕴藏着民族生命的源泉”。

童年对于杰布拉克的深刻影响,还体现于其代表作、在阿拉伯作家协会所推“20世纪105部最佳阿拉伯语中长篇小说”榜单上排名第2的《寻找瓦立德·马斯欧德》。小说以倒叙和闪回、多声部和内心独白等手段,试图揭开主人公功成名就却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的谜。巴勒斯坦人瓦立德·马斯欧德,早年求学和谋生于异乡,后定居巴格达,是当地颇有声望的银行家兼记者、知识分子,事业兴隆,风流倜傥。然而,巴勒斯坦的土地丧却是他心底永不释怀的痛。马斯欧德失踪是否为了参加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小说未给予明确答案。主人公的平生是由朋友们各自的断片式回忆拼贴成的,直至最后依然朦胧不清。相比之下,主人公自述的童年岁月却异常清晰,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本人童年岁月的翻版。

再譬如,当今在世的巴勒斯坦最杰出的诗人穆利德·巴尔古提所创作的自传《我看见了拉马拉》(1996),叙述了自己在流亡30年后,对拉马拉及附近家乡的重访。全书以作者回乡之行的起点——连接约旦和西岸地带的阿伦比大桥起笔,在黎巴嫩大歌唱家菲露兹的歌声中,此桥被称为“回归之桥”。作者站在木桥上放眼望去,身后是颠沛流离的足迹,前方是阔别已久的、梦中的祖国和家园,由此引出万千思绪,欣喜激动中夹杂着悲伤、惊讶与悔恨,不安之感为全书奠定基调。在这个入境处,他被一个自我质疑几至打倒:他是谁?一个难民?一个市民?一个访客?他不知道。前方的这片土地有多种定义——家乡、西岸和加沙地带、被占领土、自治政府、巴勒斯坦、以色列。当他上一次位于此处时,一切还算明朗,如今一切却变得模糊。尽管奥斯陆协议已经签署,阿伦比大桥仍以官方把控,在以色列士兵黑洞洞的枪眼面前,巴尔古提感受到了巴勒斯坦人悲凉的

歌舞升腾“红磨坊”

□董 纯

歌舞兼仿技、杂耍招揽观众。舞娘中最出众的是艺名叫“咕噜女”的“开心果”,总会搔首弄姿妙语逗人,开释观众愁怀。其他诸如“狂女珍妮”、“奶酪小妞儿”、开课授技的“翘足妮妮”和仿技无可比拟的伊凡特·吉贝儿,它们在舞厅里花枝招展,各显其能,赢得四方顾客欢心。

蒙马特尔画家杜鲁兹·罗德莱克用彩笔将这些歌星舞姬炫示在他的“红磨坊舞会”系列招贴画上,传遍五洲四海,流芳后世。最为精彩的,是他1894年画的伊凡特·吉贝儿。此画幅将这个一头棕红浓发、面庞白净,身着绿衫的霹雳娇娃描绘得活灵活现。至今,“红磨坊”的舞娘们仍依照此画展现世人眼前。

“红磨坊”里美色如潮,1907年出道的舞娘翘楚蜜丝坦盖特姑娘是另一位惹眼的弄潮女,被誉为华都歌舞厅“女皇”。此女献艺时野性放浪,向台下看客频飞媚眼,充沛传递出地道的“巴黎神韵”,显示正宗的纯粹的拉丁气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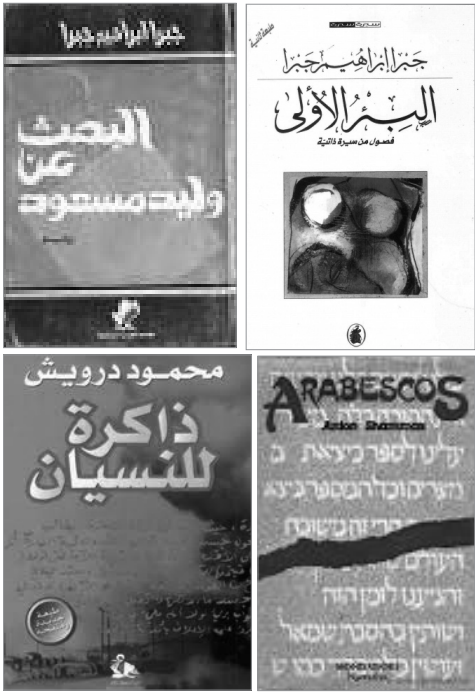
法国康康舞的发源地

“红磨坊”演出的节目色彩缤纷,登峰造极的当数康康舞。康康舞也称唧唧舞,始于19世纪的狂欢节,系舞蹈家塞莱斯特·摩加多尔首创,由一对表演者在巴黎传统节日音乐声中狂舞8分钟,舞者的灵活程度几近杂技,最终在热烈狂放的节奏里东步。《德拉斯舞辞典》确认,康康舞出现于1830年,本是一种粗犷的低俗表演,舞蹈女子要模仿母鸡,她们着装挑逗,与当时妇女身穿短裤、外套长裙的风俗相悖。

康康舞后来由伦敦艺人查理·墨顿改进,以适应旅游业的需要,演变成了“法国康康舞”,并采用有德国血统的法籍作曲家奥芬巴赫的乐曲伴奏,比先前优雅少许,最后在“红磨坊”落脚。由此,康康舞里添进了奥芬巴赫式的幽默和欢快,与这位第二帝国吹鼓手的风格密切联系在一起。关于这种舞蹈的起源,还有另外一说,追溯到18世纪,据传,它曾是蒙马特

历史:“他的枪从我们这里夺走了诗歌的土地,留给我们关于土地的诗歌。他的手中握着土地,而我们的手中握着幻景。”

流离者变成自己回忆里的异乡人,更只能紧紧攀附着回忆,由脚下的木桥生发开去,作者将跨度30年的回忆倒叙,铺陈在回乡纪行中,一揽子的记忆在其中自然地往返流动,在有意无意间将往昔推向当下,呈现于读者面前:巴尔古提出生于拉马拉附近的德尔·卡萨纳,1966年离开家乡,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开罗大学文学院准备学位答



①《寻找瓦立德·马斯欧德》②《第一口井》③《为了遗忘的记忆》④《阿拉伯式》

辩。不到几日,整个西岸就被以色列防卫军占领了,包括拉马拉。巴尔古提发现自己成了众多流离失所者中的一员,且归期无日。他在埃及结婚生子,却因批评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而遭到后者驱逐,孤身前往布达佩斯,担任世界主义青年联盟的巴解代表,与留在开罗的妻儿分离达17年之久。奥斯陆协议的签署给了他重访家乡的机会,这次意义重大的、五味杂陈的回乡行,孕育出这部情感真挚的自传。因其笔触细腻深刻,从而获得1997年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文学奖。爱德华·萨义德在为该书英文版撰写的前言中,称其为“一部最佳的、反映我们正所在经历的巴勒斯坦流散的存在主义作品”。詹姆逊认为,“桥”在世界文学艺术中的原型意义“似乎在于它表示出一种悬空感”。也许正是“桥”给了巴尔古提以灵感,让他在“悬空”中保持高度的清醒,在不断的质疑中引发自身对流亡、身份及生命状态的全面思索,由此成就了这部自传。

谈到忆中那熟悉的气息,笔者想到的是巴勒斯坦的另两部优秀文学作品——安通·沙马斯的类自传体小说《阿拉伯式》(1986)和马哈穆德·达尔维什的散文诗般的回忆录《为了遗忘的记忆》(1995)。

《阿拉伯式》由“故事”和“讲述者”两部分组成。“故事”叙述19世纪初沙马斯的阿拉伯基督徒家庭从叙利亚移民至巴勒斯坦,定居于加利利附近一个小村庄的传奇经历。在安通·

沙马斯笔下,故乡是个充满了欢乐与悲伤、热情与迷信的美丽田园。作者围绕“我曾经是谁”的问题,描绘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回忆在尤素福叔叔身边听故事的场景,直至以色列军队占领家乡。这是一个失落的阿拉伯共同体的“故事”。“讲述者”则围绕“我现在是谁”的问题,叙述沙马斯从美国爱荷华州和巴黎游学归来,作为二等公民生活在以色列统治之下的疏离感,以及与家乡父老隔绝的负疚感。在小说中,叙事者沙马斯寻找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失散的堂兄米歇尔·阿布雅德,后者曾以沙马斯的名字加入反以敢死队。沙马斯最终在美国爱荷华州找到了堂兄,米歇尔交给沙马斯一个手稿,称“这是以你的名字撰写的虚构性自传”,并说:“我的虚构的名字,也是你的名字。将这份稿子翻译出来,增删均可。但是,请一定把我留在里面。”沙马斯苦苦寻觅同名的堂兄,以修补分裂的身份,完成自我救赎,但是,已分裂的身份是无法再度统一的。

《阿拉伯式》是安通·沙马斯用希伯来语创作的小说,出版后引来各方关注,1988年美国《纽约时报》曾将其评为最佳图书之一。在以色列,它一直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文学界文学诗的对象,被称作非犹太作家在希伯来现代文学史上投下的一枚“重磅炸弹”。阿拉伯文学界虽然对沙马斯用占领者的语言进行创作颇有微词,却无法否认这是当代巴勒斯坦一部优秀的流散文学作品,因为其中弥漫着巴勒斯坦那浓厚的乡间气息和风土人情:“我来到橄榄油炸坊的门口。我能闻到橄榄皮炭的香气从遥远的岁月深处传来。这是一种很浓的味儿,它温暖地包裹着你的整个感觉,微风拂过秋天的尽头后,才渐渐散去……”(译自小说第二部分“讲述者”开篇)

《为了遗忘的记忆》以类似意识流的手法,记述了大诗人马哈穆德·达尔维什在1982年8月以色列国攻贝鲁特的一天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回忆录以清晨梦醒开篇,在隆隆炮声中,作者沏上一杯咖啡,咖啡香气带着诗人完成一天的活动。诗人在炮弹横飞的城市中穿越童年记忆、重温十字架的历史故事、回顾自己的流亡岁月……贝鲁特作为记忆的场域,将各种叙事的碎片串起,以便它们汇成一个更为复杂的场域意象,直至街道和楼房在炮声中轰然坍塌,诗人意识到自己的流亡即将重新开始。贝鲁特就像诗人的家乡海法一样,即将加入沦陷的行列。曾经的“阿拉伯抵抗之都”,在侵略者的铁蹄下被践踏,对其民众关上了大门。巴勒斯坦难民再次拾起行囊,踏上遥不可知的漫漫流亡之途。贝鲁特对他们而言又是一场记忆——流动的记忆。当十多年后达尔维什在巴黎的寓所中撰写这部回忆录时,虽时过境迁,但那杯咖啡的浓郁味道依然萦绕在心头。诗人意识到所有的记忆终究抵不过时间的销蚀,即便它曾经是那样地让人痛定思痛。在流光的威肋面前,诗人奋笔疾书,在混沌的世界中,抵抗着历史即将被抹去,抵抗着记忆即将被遗忘,一如昆德拉在《笑忘书》中的名言:“人类和权力的对抗即是记忆和遗忘的对抗。”

如何看待记忆与遗忘的关系?昆德拉尚有另一句名言:“回忆不是对遗忘的否定,回忆是遗忘的一种形式。”这是否意味着:回忆既是一个指向过去的行为,同时也是基于当下、朝向未来的建构?回忆是为了警醒,也是为了最终的遗忘。当遗忘升起的时候,人将走向真正的释然。但遗忘必定是有前提的,对于经历了无数苦难和伤痛的巴勒斯坦人尤为如此。可以说,巴以之间冲突的无解,在于巴勒斯坦人的历史记忆与犹太人的历史记忆发生了纠缠。因此,只有当双方倾听并理解彼此的记忆——其自古以来的神话、宗教、传说、憧憬和忧虑,学会在闪族的子孙内部整合彼此的叙事差异,和平才可能降临。而对于今天的巴勒斯坦民族,记忆和陈述也许是他们仅有的一个。

菌、狼鲈片、香槟奶油等,还有专为适应东西方不同游客要求准备的盛摆佳肴,套餐多以“咕噜女”、“杜鲁兹·罗特莱克”、“法兰西康康”等命名。

“红磨坊”是世界香槟酒最大买主之一,每年至少订购24万瓶,供游客在坊内畅饮。每人每餐至少得消费半瓶高级香槟。有些人喝得尽兴,“对酒当歌”,在数十名歌女舞姬陪同下,感叹人生几何。舞娘们可以应邀跟客人合影留念,供来客日后追怀到此一游的情趣。

“红磨坊”声影绵延不绝

“红磨坊”百余年来几起几落,始终由一代代辛劳的“磨坊女”在为它增添光彩。1920年,歌舞场一度被改为电影院,第二次世界大战巴黎陷落后,堕落为纳粹德国占领军寻欢作乐的场所,受尽耻辱。

1904年,新磨坊主人保尔·弗勒请请来设计师爱德华·尼尔芒,将“红磨坊”扩建成能容纳2200名观众的大型歌舞音乐厅。1951年后,雅克·克雷里果接管“红磨坊”,极力推崇一度遭受冷落的康康舞,大获成功,使“红磨坊”一跃而为全球最红火的歌舞圣殿。法国的娱乐圈大师和名伶莫里斯·舍瓦里埃、歌坛女皇艾迪特·比亚夫、影星让·伽班、伊夫·孟唐都曾相继在此登台演出过。一些国际大牌但凡来巴黎,必到“红磨坊”一显身手。迄今为止,已有数百万游客不远万里来此,欣赏康康舞表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大众文化侵入法国,“百老汇”风格也进到“红磨坊”里。“纽约棉花俱乐部”还来实地演出传经,促使巴黎艺人进一步考虑怎样迎合更多观众的口味。细心考察“红磨坊”剧目的人会发现,自1963年以来将近50年里,这所有的大型歌舞节目总题皆以字母“F”打头,例如“Frisson”(荡漾)、“Fascination”(入迷)、“Fantastic”(奇幻)、“Follement”(狂放)、“Frénésie”(狂热)云云。这些法国康康舞师均营造出一种“Fabuleux”(奇异的)气氛。近几年来,编舞者已在单个节目里加进了现实生活场景,例如受欢迎的剧目《海盗》(巴黎,无限明天)和《马戏团》。如此,演出经久不衰,来此的异邦游人惊叹:“塞纳河水日夜流,‘红磨坊’歌舞何时休!”

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



1980年4月4日,中国作家代表团应邀到日本访问,团长巴金、副团长冰心、林林,秘书长公木,团员艾芜、草明、杜鹏程、教德斯尔、邓友梅(兼秘书),随行人员李小林、艾青、陈喜儒(翻译),由北京乘中国民航航班机出发,下午到达日本成田机场。

清点行李时,出了件怪事:别人的行李都在,唯独团长巴金的行李箱不翼而飞。按照日程,第二天上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将在首相官邸会见全团,要命的是,巴老要换的衣服和礼品书都放在那只箱子里。我急得冒火,在机场多方查询,但一时没有结果,只好到饭店等待。直到午夜,箱子才找到,总算松了一口气。原来这只箱子搭错航班,飞到了上海,幸亏当天有上海飞东京的航班,才没误事。

4月2日上午10点钟,我们乘坐五辆黑色奔驰轿车由新大谷饭店去到位于千代田区永田町的首相官邸。听日本朋友说,大平首相年轻时读过巴金的书,知道巴金来日本访问,很高兴,希望和巴老见面,所以我们访日的第一个日程,就是拜会首相。

永田町一带是日本的政治中枢,国会大厦、各政党总部都在这里。江户时代,这里是大名(日本古代封建制度对领主的称谓,相当于中国古代诸侯)的府第,因永田氏在这里居住而得名。首相官邸是座不起眼的二层小楼,楼顶挂有国旗。我随巴老、冰心坐第一辆车,进到院子时,戴着白手套的警察纷纷敬礼,礼宾官跑过来开开门,引领大家到会客厅。客厅陈设简朴,铺着红地毯,摆着两排沙发、茶几。

大家刚刚坐下,大平正芳首相、官房长官伊东正义、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古井喜实、国会议员小川平二一起走了进来。几十名记者拥上拍照,快门声、闪光灯声响成一片。大平首相虽然头发花白,但步履矫健,几步跨过记者群,过来与巴老握手。

大平首相曾多次来我国访问,为建立和发展日中两国和平友好合作关系呕心沥血。1972年,大平任田中角荣内阁外务大臣时,来华与田中一起签署了日中联合声明。1974年,为缔结日中航空协定再次访华。1979年,他又以首相身份来访。他出身于香川县农家,素以慎思而著称,说话时,语调沉稳,好像认真地选择每一个词。

他说:“欢迎诸位来日本访问。我很高兴地看到,日中两国建交后,由于政府和民间的不断努力,在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各方面的交流都得到了发展。日中两国历史不同,性质不同,开出了不同的花,结出了不同的果。在世界历史上,文化的交流、普及、合作,推动了文化发展。我虽然不是文化专家,但我认为,像日中两国这样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是值得自豪的。”说到这里,他用手擦了擦脸,继续说:“但在两国文化相互研究方面还不够,需要加强。中国作家到日本来是个促进,会使文化交流,研究有更大的发展。”

巴老说:“受到大平正芳首相的热情欢迎,我们感到荣幸。首相为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作出了很大贡献,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诚如首相所说,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有许多动人的历史故事、传说和史实,至今仍激动着人们的心。中日两国人民在相互学习和帮助的过程中结下的深厚友谊,值得我们共同珍重和发扬。我们到日本来,是向日本作家、日本文化界、日本人民学习的。今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在首相的帮助和支持下,必将更加繁荣。大平首相在百忙中和中国作家代表团全体成员见面,我非常感谢。”

大平首相全神贯注地听巴老讲话,不时微微点头,翻译话音刚落,他就说:“感谢诸位对我的期望。在日本人民中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中国的故事。日本人到中国去,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支持和帮助,学到了许多东西,而我们学的多,帮的少,今后愿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现在正是樱花盛开的时候,是日本最美的季节,希望你们多走走,多看看,多交朋友。”

说到樱花,大厅里顿时活跃起来。巴老说:“我很爱樱花。1935年,我曾在上野看过樱花。在座的冰心女士写过樱花。”

大平首相想起他送给中国的樱树,问道:“我们送给贵国的樱树长得怎么样?”伊东正义说:“已经开花了。”大平首相很高兴,接着问:“樱花是日本象征,象征中国的是什么花?”巴老说:“梅花。”伊东正义说:“中国幅员辽阔,奇花异卉很多,选出一千种代表中国的花,可不容易。”

大平首相问大家来过日本没有?巴老说:“我和冰心来过几次,林林在日本留过学。”大平首相问林林:“哪个学校?”林林说早稻田大学。大平首相说:“你们都来过日本,对日本的好与坏、长与短都一清二楚。”大家笑了起来。

巴老说:“日本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大平首相笑着说:“在技术方面,日本站在稍前一点,但在精神文化方面,要向中国学习。我现在还常看中国的古典文学。小川平二君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很有研究。”

大平首相是日本政界少有的读书家。他曾说:“无论怎样忙,每星期都要到附近的书店去一次,买几本新书。当我翻阅新书时,闻着新书的香味,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柔和的感觉,感到生存的喜悦。”在他担任日本自民党总裁和首相之后,身边总跟着一群记者,他曾感慨道:“难道今后去书店看书也不行了吗?他周围的人说,每天晚上,当报社政治部的记者们结束夜访之后,大平喜欢穿着和服,坐在地毯上读书,独享读书的乐趣。他说:“日本书刊留给读者的既不是自豪,也不是自信,更不是满足,留下的始终是精神的渴求。”他还说:“日本人的作品总是介绍或模仿东西方文化,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豪感和信心,缺乏自己独特的风格,即使在战后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人仍置身于西欧和中国两股巨大思潮的漩涡中,忽东忽西,处于彷徨与苦闷中。”

巴老拿起蓝绸面的特装本《家》《春》《秋》说:“听说大平首相喜欢读书,送几本书给你做纪念。我们还带来一幅画,是著名画家吴作人夫妇合作的,题目是‘友谊之花’。”

这幅画为四尺册页,萧淑芳画的郁金簪,吴作人题词,由荣宝斋用锦缎装裱。大平首相接过书和画,观赏良久,不断点头,向巴老表示感谢。

原本计划会见15分钟,但大平首相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不知不觉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巴老说:“大平首相公务繁忙,我们就此告辞了。”大平首相、伊东正义、古井喜实、小川平二过来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

没想到,这是大平首相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见中国作家代表团,两个月后他不幸病故,但他朴实亲切的笑容,对中国人民的美好感情,为发展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令人敬重怀念。